

是追求价值中立，还是信守二元准则？

——论好科学与社会价值观

□ 陈立敏^①

摘要：对成为一门好科学来说，仅遵守认知价值观是不足够的。科学研究必须既遵守认知价值观又遵守社会价值观，才能兼具科学严谨性与社会关切性，才能成为一门好的科学。本文不仅根据若干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的经典原著进行演绎析理，而且就若干管理学理论如资源基础观、交易成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的开发过程进行回顾，分析其产生如何受到社会价值观即人的因素影响。将管家理论与代理理论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一个更好的管理学理论，是好科学同时符合认知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的极好例证。

关键词：好科学；认知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价值中立

一、价值中立理想——仅主张认知价值观

关于何谓一门好的科学，价值中立理想（value-free ideal）认为，应该仅凭是否符合认知价值观（epistemic values，指信度、效度、解释力等客观的科学标准）进行判断，社会价值观（social values，指公平正义、伦理道德等主观的价值判断）则应该被避免，因为科学的任务就是客观无偏地探求真理，一旦受到主观情境因素的影响失去价值中立，科学中就不存在客观性了（Douglas, 2009）^②。

^① 陈立敏，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非常感谢徐淑英教授等 2016 年 12 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的第一期管理研究哲学研讨班及对我的邀请。研讨会上和与会同仁贾良定教授、梁建教授，以及杨治、仲卫国、张书军、任兵等诸位教授的讨论，极大地开拓了我在本领域的视野，加深了我对管理研究哲学的理解。

^② 引自 Douglas, H. (2009) Science, policy, and the value-free ideal.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chapter4-The moral responsibilities of scientists: “There will be no objectivity left in science if the value-free ideal is gone.” (p. 79)

如此说来，科学和科学家只需追求完美的认知价值观，而不需考虑，甚至应该尽量避免社会价值观，就能或者才能产生一门好的科学？

从某些角度来看，这种观点确实有一定道理。首先，毫无疑问，认知价值观是好的科学推理规范之首要组成部分（Risjord，2014）^①，这一点不仅被自然科学研究，而且被社会科学的研究哲学所认同。

其次，恰如 Tsui（2016）所归纳的价值中立基本主张，科学家的任务是用完全的客观性来发现知识，而不为任何情境因素所影响，避免出现主观性偏见。因此，科学工作应该被内在的科学价值观所指引，而排除外部的社会价值观影响^②。

于是一种典型性的结论是，科学家只需对其他科学家负责，而不需对科学领域之外的人负责（Kaplan，1964）^③。

二、好科学的二元准则：认知价值观+社会价值观

然而就本文看来，仅仅遵守认知价值观而回避社会价值观的这种价值中立理想，对何谓一门好科学的判断是并不足够的。将认知价值

观与社会价值观结合起来的二元准则，将是判断何谓一门好科学的更合理标准。

正如 Tsui（2016）所指出的关键点：价值中立理想在实际中是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尤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主体是人类个人或群组，因此各种社会的、道德的、伦理的，以及政治的价值观，早已天生固有地存在，并不可避免地贯穿于科学研究的全过程中：研究主题、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发现，以及科学解释等。因此一门好科学的属性，一定是既包含“科学严谨性”，也包含“社会关切性”（both scientifically rigorous and societally relevant）。

因此，科学家当然需要对整个社会负责，因为是这个社会赋予科学家的角色、地位与相应责任，而不能仅仅只对其他科学家负责。由于科学家们需要考虑他们得出什么研究结论时相应会有什么后果，所以他们无法排除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因为这些权衡需要根据社会和伦理价值观来做出判断，因此社会价值观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科学推理的重要组成部分（Douglas，2009）^④。科学推理之后的结论启示和应用意义内容，就更加排斥价值中立模型。

对于这一观点，Ghoshal（2005）的举例是令人信服的。他认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管理

① 参考 Risjord, M. (2014)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Routledge, New York. 原文为：“Epistemic values are part of the norms and standards of good scientific reasoning.” (p. 18)

② 引自 Tsui, A. (2016) *Reflections on the so-called value-free ideal: A call for responsible science in the business schools*. *Cross Cultural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3 (1): 4-28. 原文为：“Scientist’s role is to discover knowledge with objectivity, unbiased by any contextual factor.”

③ 参考 Kaplan, A. (1964) *The conduct of inquiry: Methodology for behavioral science*, 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 San Francisco, CA: “Scientists are accountable only to other scientists and not to people outside the scientific fields.”

④ Douglas, H. (2009) 原文为：“Scientists should consider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error when deciding which claims to make, then values have an unavoidable place in scientific reasoning” (p. 66), 以及 “such a weighing would require the use of social and ethical values in scientific judgment” (p. 80)。

学,与属于自然科学的物理学和数学模型不同,其学科理论由三部分组成:意向性解释(intentional explanation)、功能性解释(functional explanation)和因果性解释(causal explanation)。社会科学研究一定会受到某种研究意向的影响,也不存在类似生物学中自然选择的通用功能性解释——因为不同环境和条件下的机制常常不同,所以因果模型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因此在商学院中,如果采用不考虑研究意向、只注重因果模型的所谓“坏理论”来进行教学,则管理实践将被这种教育所损害。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本来,假设管理者为经济人,选择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Jensen & Meckling, 1976),和假设管理者为社会人,选择和委托人一起利益最大化的管家理论(stewardship theory)(Davis et al., 1997),两者结合在一起将更接近企业实践。然而,由于代理理论由非常精致的数学模型组成,于是不管是学者们对理论的青睐,还是商学院对学生的教育,以及理论对企业管理实践的指导,都大大地向代理理论这一面倾斜了,而忽视了本来与其互补才更符合实际世界的管家理论。因此,企业的功能变成仅仅回馈股东,而没有给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员工、整个社会)以足够的重视,由此引起管理实践中本可以避免的种种问题——这些实际中的问题不仅没有因为好的管理学理论而获得解决,反而正是由于坏的管理

学理论误导所引起。

在这里, Ghoshal (2005) 所谓“好”的管理学理论,就是既有好的“社会价值观”——代理人不能仅仅谋求个人利益,而应对委托人和各利益相关者负责;同时也更符合“认知价值观”——代理理论加上管家理论更符合真实世界。而所谓“坏”的管理学理论,则是仅追求完美的“认知价值观”(代理理论的精致优美数学模型)^①,而不考虑“社会价值观”(没有解决,反而强化了委托—代理问题),而最终也偏离了对管理实践的真实认知(并不是每个代理人都是仅仅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完全经济人,很多代理人也可成为同时追求最大合作效益的社会人)。

上述以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共同构成具有社会价值观的、好的管理学理论的例子,实际上也是和 Lakatos 所说的“研究方案”(research program) 观点相吻合的(Godfrey - Smith, 2003)。Lakatos 认为“研究方案”的说法优于 Kuhn 的“研究范式”(paradigm),因为“研究方案”是一种在一个时期内有多种竞争计划可以共存的研究安排,因此不会限制科学的发展;而“研究范式”则是常规科学的主导范式,在同一段时期内只能有一种范式唯一存在,只有经过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才能转移到下一个主导范式,此即所谓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Kuhn, 1962)。关于摆脱范式限制, Feyerabend 则走得更远,主张“认识论无政府主义”(epistemological anarchism),即所

^① 实际上,这个研究问题也并不能被简单数学模型化,除非进行了简化的不合实际的前提假设。正如 Ghoshal 所说,科学工作要比模型化复杂得多,常常需要我们做一个案件侦探(detective)而不仅是实验人员(experimenter),做一名探险家(adventurer)而不仅是数学家(mathematician)。

谓的“anything goes”（Godfrey-Smith, 2003），拒绝任何加在科学研究方法上的规则，认为这些规则只能束缚科学创造性。

三、管理学者如是说：人的因素如何影响理论开发？

在北大光华第一期管理研究哲学研讨会上，我们还阅读讨论了 Smith 和 Hitt（2005）编撰的《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理论开发过程》中几位著名管理学家的研究回顾。这几个重要理论开发者的亲身体会，更加印证了社会价值观对科学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

首先是我非常欣赏的 Jay Barney 所写的研究回顾：《不平等从何而来？——资源基础观产生的个人根源和知识根源》，正如该篇标题所昭示的，Barney 强烈感到“对真理的探求总是要被个人经验所制约的”。他说“所有的写作都是一种自传”，而高强度高聚焦的研究工作尤甚，研究论文蕴示了特别个人化的含义。对 Barney 自己来说，由于他一直认为不平等的对与错是一个关键问题，并持有价值观“不仅社会中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时这种不平等是一件好事”，这和当时流行的情绪^①“不平等对社会有害”大为迥异，因此才发展出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

在同书中也进行了理论发展研究回顾的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实际上也是在研究不平等问题的，只是其采用的方式是解释组织层级（hierarchies）

为什么会存在。本质上来说，组织层级就是有些人对另一些人发号施令的地方，但是这种不平等是有效率的，而且从长远来看会有利于整个社会中的所有成员。

从这个角度考虑，该书中另一个著名理论——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也是研究不平等问题的，只是采用的方式是研究角色之间不平衡的“权力—依赖关系”（power-dependence relationship），这种不平衡的权力—依赖关系最终将导致权力优势和不对称依赖的存在。不约而同的巧合是，Pfeffer 也在研究回顾中强调了社会价值观对科学研究主体——人，从而对科学研究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影响，而且这一鲜明观点也被放在标题中，Pfeffer 该篇研究回顾的标题是《资源依赖理论：看理论如何被所在环境影响？》。可见，理论的发展深深地受到人的因素——个人价值观和环境背景影响，这一观点是这些管理学家的在回顾理论发展过程时的共同结论。

四、好科学为“真”亦为“善”：诺奖设立的初衷与科学研究的意义

最后，本文用一个实例来说明社会价值观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即著名的诺贝尔奖设立的动机。作为杰出的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以硝化甘油制作炸药的发明而闻名于世，他同时也兴办企业，在欧美各国开设了上百家工厂而积累了巨额财富。然而在他晚年，哥哥

^① 确实，Barney（2005）使用的正是情绪 mood 这一比价值观 value 更加主观的词汇：“Popular mood of the day seemed inequality was bad for society。”

Ludvig Nobel 于 1888 年去世的时候，一则报纸张冠李戴的新闻报道让他非常痛心：这家法国报纸不但错误地刊登了 Alfred Nobel 去世的消息，而且使用的措辞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博士，因找到了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杀死更多人的方法而发财的人，昨天去世了”。

的确，硝化甘油炸药虽然是一个突破性的发明，但如果不能很好地用于房屋桥梁隧道等建筑工程，就成为了一种大威力的杀人机器。诺贝尔想到自己可能要以“死亡商人”的称号被后人铭记而十分痛心，就在这种痛心中他深切意识到：科学发明不仅要有重大科学性突破，更要保证给人类带来有益的贡献！因此在 1896 年他即将辞世之际，诺贝尔用自己的财产设立了一个基金和奖项，要求正是颁发给那些对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由此可见，若科学家的研究目标是发明一种最具威力的炸药，或者一种最具毒性的毒药，并且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用最低的成本研制出来，毫无疑问，这已经很好地遵守了科学严谨性和认知价值观；但是，即使所有这些目标完全被达成，也没有符合一门好科学的标准，因为其没有履行社会责任。

反过来，如果其研究意旨是研制出治愈不治之症的良药，减少世界上的疾病痛苦和生离死别；或者发明出性质最优良、成本最低廉的建筑材料，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么，这一科学研究就既有科学严谨性又有社会关切性，从两方面符合了一门好科学的标准。好科学应该是一服社会良药，哪怕渐趋完善；而不

能是一服科学毒药，即使有突破性速效（Good science is a society remedy, no matter how incremental; instead of a scientific poison, even if instant effect）。

因此，我认为徐淑英教授所提出的“科学严谨性”与“社会关切性”（scientifically rigorous and societally relevant）的二元准则，是判断何谓一门好科学的殊为合理的标准。好科学一定要兼具“认知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它不仅是符合“真”的标准、认知正确的科学，也是符合“善”的标准、对社会有用的科学。恰如 Tsui（2018）进一步提出引导负责任研究的七项原则之一“同等重视基础贡献和应用贡献”，一方面我们需要极其重视基础研究，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一个好理论更加实用^①；另一方面也要同等重视应用研究，让研究结果不仅是严谨正确的，更是对社会大有益处的。这是科学研究的意义所在，也是我们科学工作者的责任。

（接受编辑：李海洋

收稿日期：2018 年 8 月 2 日

接受日期：2018 年 9 月 6 日）

参考文献

[1] Thomas Kuhn 著，Ian Hacking 导读：《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2] 徐淑英：《负责任的商业和管理研究愿景》，《管理学季刊》，2018 年第 4 期。

^① 引自 Shapira, Z. (2011) I've got a theory paper—Do you? Conceptual,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knowledge in the organizational sciences. *Organization Science*, 22 (5): 1312–1321. 该文题记：“There is nothing so practical as a good theory.”

- [3] Barney, J. 2005. Where does inequality come from? The personal and intellectual roots of Resource-Based Theory. In *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 The process of theory development*, edited by Smith & Hitt, chapter 14.
- [4] Davis, J. H., Schoorman, F. D., & Donaldson, L. 1997. Toward a Stewardship Theory of manage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2: 20-47.
- [5] Douglas, H. 2009. *Science, policy, and the value-free ideal*.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Pittsburgh, PA.
- [6] Ghoshal, S. 2005. Why bad management theories are driving out good management practic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4 (1): 75-91.
- [7] Godfrey-Smith, P. 2003.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Theory and reality*. Chapter 7—Lakatos, Laudén, Feyerabend, and framework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8] Jensen, M., & Meckling, W. 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305-360.
- [9] Kaplan, A. 1964. *The conduct of inquiry: Methodology for behavioral science*, Chandler Publishing Company, San Francisco, CA.
- [10] Kuhn, T.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1] Oliver, E. W. 2005.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he process of theory development. In *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 The process of theory development*, edited by Smith & Hitt, chapter 23.
- [12] Pfeffer, J. 2005. Developing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How theory is affected by its environment. In *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 The process of theory development*, edited by Smith & Hitt, chapter 21.
- [13] Risjord, M. 2014.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Routledge, New York, NY.
- [14] Shapira, Z. 2011. I've got a theory paper—Do you? Conceptual,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knowledge in the organizational sciences. *Organization Science*, 22 (5): 1312-1321.
- [15] Tsui, A. S. 2016. Reflections on the so-called value-free ideal: A call for responsible science in the business schools. *Cross Cultural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3 (1): 4-28.